

聆听海峡对岸的声音

从台湾 看大陆

几位学者的观察

合
著

赵
国
材

杜
震
华

汤
绍
成

朱
高
正

汤绍成
编著

聆听海峡对岸的声音

从台湾 看大陆

几位学者的观察

合 著

赵国材

杜震华

汤绍成

朱高正

汤绍成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从台湾看大陆. 几位学者的观察 / 朱高正等著.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4.1

ISBN 978-7-5057-3039-7

I. ①从… II. ①朱… III. ①中国—概况—现代

IV. ① K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21172 号

书名	从台湾看大陆——几位学者的观察
作者	朱高正 汤绍成 杜震华 赵国材 合著 汤绍成 编著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710×1000 毫米 16开 13 印张 141 千字
版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039-7
定价	32.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序言

最近这些年来，中国大陆的国际地位一直在不断攀升，尤其在 2008 年 9 月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一枝独秀，中西方势力的消长，对比鲜明。虽然大陆一些地区地方性小规模骚乱不断，污染、腐败和人权情况受到西方国家严厉批评，但是整体的发展受到各国重视的程度不断提升，也是不争的事实。美欧国家自金融危机以来所犯下的错误，还要大陆予以善后与救济，前所未见，更加强了吾等对当前大陆经验与两岸情势进一步探究的动力。

也正是由于中西情势的转变，不少欧美学者都已经开始对西方的价值、制度与政策产生疑虑，比如《当中国统治世界》（作者 Martin Jacques, 2009）与《后美国时代的世界》（作者 Fareed Zakaria, 2008）

从台湾看大陆

的问世，是否意味着以往西方的普世价值已陷入困境？当“中式和平”（Pax Sinica）盛行之际，这是否代表着“英式和平”（Pax Britannica）与“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的衰落？

当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在2009年称，1989年的“华盛顿共识”已经结束，这是否意味着“北京共识”将取代其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模式”是否是一种向西方的挑战？是否将危及欧洲和美国的利益？这是否说明了“白人的负担”转换成了“中国的责任”（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2007）？

再以外部情势观之，2007年，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接见达赖之后，在欧洲掀起了一阵达赖的“旋风”，再加上2008年一些欧洲国家对北京奥运的杯葛态度，使得中欧之间的关系受到甚大冲击。2009年10月，法兰克福书展上的一些事件，再度引发中德之间的争议。

综观欧洲国家的这些作为，我们深感不以为然。欧洲人还是不改其唯我独尊与好为人师的态度（Eurocentrism），以为自己的经验就是唯一真理，四处传播，强加于人。此外，美国也曾执意在南海与黄海举行军演，并干涉我国南海的主权，甚至与日本在钓鱼岛海域联合军演，这些行为都是对我国领土主权的侵犯。这些事件都增强了我们从中华传统文化以及现实的情势中找寻答案的动力，以便强化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以及对不同意见者的感召力。

再从台湾的角度来看，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台湾的企业陆续向大陆投资超过 3000 亿美元。自 2003 年以来，大陆已经成为了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岸贸易约占台湾整体对外贸易的 40% 左右。目前，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已在 2011 年元旦生效，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存度势必会持续增加，双方正在逐步形成一种“命运共同体”（Schicksalsgemeinschaft / community of fate）的机制与关联。

因此，大陆的稳定和发展对台湾至关重要，更增加了我们对大陆与两岸情势表达意见的权利。我们对大陆在许多方面的表现感到自豪，因而有意共襄盛举。当然，对不尽如人意之处，也会提出批评。质言之，吾等都有感而发，据实以报。我们四人各有所长，有志一同，期盼能借此书抛砖引玉，为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与感召力，以及两岸关系的和平与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自马英九上台之后，曾经颁发公文给各机关，要求避免以“中国”来称呼对岸，而应改为“中共”、“大陆”、“北京当局”等，因为台湾若以中国称之，将会引起中国是外国的疑虑。中国乃包括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之地。因此，本书使用“大陆”此名称，以强化两岸一体的态势。因而，我们决定以《从台湾看大陆——几位学者的观察》作为本书的书名。

本书的四位作者都是留学欧美的学者。高正兄与我都是留学德国波恩大学，我主修国际政治学，以德国统一前两德关系为主要研究内容，日后又涉及欧盟的对外政策、亚欧关系以及海峡两岸关系的内涵。高正兄是波恩大学哲学博士，钻研康德人权哲学多年，并多次获得国内外的

从台湾看大陆

肯定，最近对易经与新儒学等，也有极为深刻的研究，如此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在吾辈中无能出其右者。当我提及此出书构想时，立即获他大力支持，故有关中国价值这一部分，就由高正兄执笔。

震华兄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任教台湾大学“国发所”逾20年，对国际贸易、经济发展、对外投资、公营企业都有极为专精的研究。我俩还是新党籍民选的“国大代表”，在阳明山共同奋斗了四年（1996—2000）。我对震华兄的学养极为仰慕，并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感，在此也感谢震华兄在百忙中立即应允鼎力相助，并负责有关经济部分的撰写。

国材兄的资历更是超人一等，曾获得挪威奥斯陆大学国际事务与和平研究所硕士、英国剑桥大学法律系法学学士及硕士、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硕士、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学博士等学位，并获联合国海上维持和平训练文凭，现为台湾政治大学外交学系专职教授，讲授国际公法、国际法与外交、战争法与中立法、国际私法等课程逾20年，乃外交学界的翘楚，因而商请国材兄撰写有关外事政策部分，也立刻获他正面响应。

本书各章节的内容，都是由我们共同研讨后定稿，但仍文责自负，并由绍成总其成。由于我们都来自台湾，立场与观点可能与其他华人不同，更可以截长补短，相互切磋。

目 录

第一章	思想意识篇 / 朱高正	1
第二章	政治特色篇 / 汤绍成	69
第三章	经济发展篇 / 杜震华	109
第四章	外事政策篇 / 赵国材	163
结语		194

第一章

思想意识篇

朱高正

朱高正是朱熹（1130-1200）第26代后裔，专研南宋儒学。朱博士于1954年生于台湾省云林县，他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并获得德国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是一位研究《易经》和康德哲学的专家。他的有关康德哲学的德文著作，被康德权威杂志《康德研究》（KANTSTUDIEN）视为当代四本研究康德哲学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更称他为20世纪传播易经的最后一位大师。

朱博士也是台湾著名的政治活动家，1986年他是民主进步党（民进党）的发起人之一，并推动“国会”全面改选，以及迫使国民党解除戒严与回归“宪政”民主。朱博士被公认是台湾民主化的头号功臣，他促成了对大陆探亲，并最终促使蒋经国结束了隔阂38年的两岸情势。

朱博士坚决反对“台独”，一直视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为自己的职责，以便实现中国的全面现代化。他不遗余力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早在1995年，他已经出版《近代中国的崛起》并预言中国的兴起。当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博士在他的序文中写道：“朱博士的勤奋学习、在政治上的诚意，使我深信，他的思想必将对21世纪的中国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大陆第一届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也极为尊重他，并称他为“超越台湾海峡矛盾的人”。在邓小平先生去世后，朱博士写了纪念文章。邓小平先生的胞弟邓垦先生看完后感叹说：“就算是在中国大陆，如此深刻了解我哥哥的人都极为罕见。”

从台湾看大陆

自从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最瞩目的话题，莫过于“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牵动了各方的关注，首当其冲的，就是主导了近现代世界最近 500 年发展的西方势力。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对“美欧中心主义”（US-Euro-centrism）的质疑与挑战，但却也给了包括阿拉伯世界，以及相对穷困的亚、非、拉丁美洲等非西方国家对另类选项的期待。

如果用历史的长镜头来看，中国自有一套极其宏伟的国家哲学，这套国家哲学来自前古圣王，由孔子把它总结于《大学》之中。《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在于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

要想在天下弘扬光明正大品德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先要修养自身的品性；要想修养自身的品性，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要想端正自己的心思，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要想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先要使自己获得知识；获得知识的途径在于认识、研究万事万物。通过对万事万物的认识、研究后才能获得知识；获得知识后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后心思才能端正；心思端正后才能修养品性；品性修养后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管理好家庭和家族后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

上自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为根本。若这个根本被扰乱了，家庭、家族、国家、天下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

不分轻重缓急，本末倒置却想做好事情，这同样也是不可能的！

中国传统的国家哲学与西方的根本差别，在于双方对人性的基本了解有所不同。在传统儒家，孔子虽没直接主张人性本善，而且很少论及性、命与天道，但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他的确是性善论的奠基者。

孔子主张仁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内在本质，而孟子对性善的意见，乃是进一步发展了儒家仁的思想。北宋周敦颐（1017-1073）、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与张载（1020-1077）所代表的新儒家，以及南宋的朱熹（1130-1200），他们将其思想的精髓深度与德治相结合，并将孔孟的性善主张推向高峰。换言之，人性本善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

西方世界由于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因此“原罪”的观念浸灌到一切神学、伦理学、人性论与人生哲学之中。由于“原罪”的观念根深蒂固，使得性善论在西方很难发展，而人性本恶倒成为主流。如近代西方国家哲学的名家，即英国的霍布斯在其代表作《利维坦》（*Leviathan*）中就主张人性本恶，在所谓的“前国家状态”（pre-state），也就是“自然状态”（*status naturalis*），那是处在“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之中，这与禽兽在丛林中的掠杀与抢食无异。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向来主张人性本善，因此孔子才会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从台湾看大陆

有耻且格。”这就是说，治理国家以法制禁令来引导百姓，不听从的就以刑罚来惩治他们，那么老百姓只求苟免于刑罚而已，并无羞耻心，表面上虽不敢为恶，然为恶之心却未尝止息啊！

主政者如能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则百姓受其感召，起而效法。然所受的感召有浅深厚薄的不同，又以礼节制度使其知所遵循，那么百姓非但耻于不善，而且能格其非心。可见“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只能使民远罪而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则可以使民迁善而不自知。这就是孔子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思想。

就像王安石所说的“律是八分书”，法律只能管理人的外部行为，只能禁人为恶，而无法劝人为善。其实，真正的教育无不在于唤醒受教者的自觉，从而自学、自律而自主。天下第一等人就是能管得住自己的人，他就是自己的主人翁。管不住自己的人，其结果就是需要别人来管他，他就难以当自己的主人了。

而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向来就主张“原罪”，他们对人性的认识可总结为“信任固然好，但控制更好”（Vertrauen ist gut, aber Kontrolle noch besser/Trust is good, but control still better.）。这种思维深刻影响西方近现代的国家哲学，因此在西方社会向来崇尚“法治至上”。

契约论之所以在西方深入人心，成为当代民法典债权的主要内容，与“法治至上”脱不了关系，契约论其实是私法自治的体现。人与人之间不是像中国靠“仁、义、理、智、信”来维系，而是靠双方意思表示的合致来规范双方的外在关系，其结果是连国家的正当性到

最后都要靠契约论来论述。然而契约论的背后，则隐藏着人与人之间的极度不信任，才会强调控制比信任好。

而法治的流弊，就是强者对契约文本拥有解释权，使得弱者被依法有据地任意欺凌与剥削，公平的契约关系是从不曾存在的。

特别是当达尔文 1895 年在英国出版《物种起源》一书之后，远在美国的斯宾塞，坚持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引进社会哲学。他发展了一种残酷无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对任何社会保障的权利，反对保障弱者的生活和工作，因为这会损害社会进化的自然进程。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对资本殖民帝国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与个人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相结合，更深化了西方世界内部的矛盾，以及扩大了非西方世界人们的苦难。

最近 500 年西方世界内部的斗争史，其中包含一国内部新兴资产阶级对旧势力既得利益阶级的斗争、19 世纪劳工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女性对男性父权沙文主义的斗争，还有为了抢夺海外殖民地或扩张本国利益而引起的斗争。两次世界大战其实也是西方世界内部的冲突。他们在非西方世界所犯下的种种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无不与这种西方的人性观与国家哲学有关。

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当然不再是过去那种僵化的教条，而是一种更为圆融、成熟的社会主义，是真正以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工业社会新思潮的生成与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很坦然、自信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

从台湾看大陆

济”，不再过分简约地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再否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事物。同样，我们也可以有步骤地进行民主法治建设，对代议民主政治，也不再以“资产阶级民主”一句话即全面否定，而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视为现阶段的重点工作。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与西方有差异。我们要的“社会主义”，必须能够批判与继承“自由主义”优良的传统（比如公平竞争、开放思想、私人企业等等），至于所谓“中国特色”，则指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状况相结合：既不能脱离中国当前的现实，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不能脱离中国的传统文化，此乃完成国家现代化的精神资产而不是负债。而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以及日后的新儒学，都注入了佛家与道家的精粹，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潮。儒学中这种讲理、崇理的态度，则可以成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两大思潮相会通的依据。兹以儒学为例，略论中国文化主体意识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结合之道。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儒学（尤其是新儒学）不但可以会通自由主义，还可以补强自由主义的不足。自由主义可贵之处，在于论证人格的自由、自律与自主，从而立证人的尊严，而以此为基础来规范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要受到人的尊严与人权的约束。这一点可从战后制定的《联邦德国基本法》（Grundgesetz/Basic Law，即宪法）第一条第一项得到印证，即“人的尊严不可亵渎”。

将“人的尊严”提高到人权之上，在西方哲学史上最强调

人的尊严的哲学家，非康德莫属。康德说：“人本身就是目的”（Selbstzweck），“人不可只被当做工具使用”。而其立论的主要理由，就是因为人是有理性的，因此人本身就是目的。

其实，莱布尼兹、沃尔夫等人深受新儒学的影响，而两者的理性主义，正是康德先验理性主义的基础。新儒学继承了孔孟的性善论，更进一步主张，人是五行之秀、万物之灵。而另一位大儒张载则在《西铭》中直接说，人是父天母地所生，从天人关系的角度来立证人是五行之秀、万物之灵，敬重上天，当然也要敬重作为天地之子的人了。

正因为人是天地之子，因此人一生下来除了形体（阴阳五行之气的精华）以外，也被赋予天理，所以程颐才会说“性即理也”。从新儒学的角度，显然可以补强康德对人的尊严的立证。

仁的理想可以缓解自由主义的弊病。“仁”是孔门最高的人格理想。“仁”并不是抽象而遥不可及的，它就体现在我们平常生活日用之间。从“仁”这个字来看，那是“二人为仁”，也就是“仁”之大用，乃在妥善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近代西方自由主义的最大弊病，就是和个人主义纠结在一起，过分强调个人的自由，结果过于高亢的个人主义一旦与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就到处看到强凌弱、众暴寡的现象。而儒家“仁”的理想，正好可以缓解这种弊端。只有妥善处理好人际关系，才能建构和谐社会。而互相的礼让、体贴则是建立良好关系的前提。